

#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主义的嬗变及其 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影响

徐圣龙<sup>1</sup>, 胡 键<sup>2</sup>

(1.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2. 上海社会科学院 软实力研究中心, 上海 200020)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主要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建构民族主义范式。它继承了革命、建设阶段的民族主义资源, 并在尝试维持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平衡关系的基础上, 开启现代化建设、逐渐融入世界体系。第二阶段萌芽于 90 年代中后期, 形成于 21 世纪, 主要是社会领域自主式建构民族主义范式。它强调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民族本位, 既构成国家民族主义的基础支持, 又容易破坏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平衡关系。第三阶段是 2010 年前后,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有效弥合了国家自上而下建构民族主义与社会自下而上自主式建构民族主义的潜在矛盾, 实现国家与社会在民族主义建构中的有效上下互动, 持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融入世界的进程, 不断实现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统一。

**关键词:** 改革开放; 现代化; 民族主义; 国家; 社会

**中图分类号:** D616; D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8)05-0024-10

##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XU Shenglong<sup>1</sup>, HU Jian<sup>2</sup>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241;  
2. Soft Power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m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from 1980s and the 1990s, the state constructed the nationalism paradigm from the upper to the lower; it inherited the nationalist resources of th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stage, and on the basis of trying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opened up modernization and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world system. The second stage sprouted in the late 1990s, formed in 21st century, the social domain constructed the nationalism paradigm autonomously. It emphasized the national standard on the basis of dualistic opposition, not only constituted the basic support of national nationalism, but also easily destroyed the balance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The third stage was around 2010, the theory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effectively bridged the potenti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which constructed the nationalism paradigm from the upper to the lower and society which constructed the nationalism paradigm from the lower to the upper, realized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收稿日期: 2018-06-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数据与民主治理范式的转换研究”(编号: 18CZZ014)

作者简介: 徐圣龙(1988-), 男, 安徽庐江人,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大数据与民主治理。  
胡 键(1968-), 男, 湖南道县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ism continued to promote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and continuously realized the unific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 and world interests.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 up; modernization; nationalism; state; society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世界范围内的互联互通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地方性、局部性的要素都被纳入到全球化的体系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sup>[1](p35)</sup> 按照这一发展逻辑,民族的要素会逐渐让位于全球化的趋势。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演进中,与全球化相伴随的,反而正是各地的民族主义思潮或运动,甚至民族主义构成了现代化实践的重要推动力,或者动力来源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向全球弥散扩张的现代化通常与不同的民族主义相伴而生,互为背景,呈现一种高度的相关关系”。<sup>[2]</sup> 那么,马克思所描述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1](p35)</sup> 是否可能,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得以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民族远没有失去其经济功能。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中,还不能由局部的甚至不断扩张的全球性要素,得出民族主义的“消亡”。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指出的,“那种认为民族主义不久将来被替代、民族即将被超越的预测是愚蠢的。两者仍然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和大众传播文化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似乎不能提供集体信念、尊严和希望,而这些则只有‘宗教替身’才能提供,它同时还承诺经几代人的努力建立地域文化共同体”。<sup>[3](p192)</sup> 不过,这也不能轻易否定马克思所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向及其不可避免性。另外,民族主义并不因为其“必要性、功能性与根植性”,就可以否定民族主义口号下的破坏性,即“导致分裂、动荡和破坏的能力”。<sup>[3](p191-192)</sup> 因此,如何处理全球化过程中民族主义的角色、功能及发展这一矛盾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我们很难轻言放弃民族主义,特别是其在集体认同、尊严与回忆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容纳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但也可能会因为民族主义的破坏性而遭遇中断,乃至爆发冲突。如何从全球融合的角度定位民族主义,这并不容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使就民族主义的经济功能而言,它也获得了相应的合法性表述。第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融入世界,即全球化的过程。这要求民族主义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获得合理的定位,并释放其积极效应,赋予其合理内涵。第二,民族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经历了不同时期的角色-功能,对其负面效应也需要保持较高的警惕。特别是民族主义导向下对于全球化的抵触情绪。如何处理中国语境中的这对关系,马克思有关全球化的表述值得参考,即将全球融合作为发展的趋势性设定。同时,又需要考虑到阶段性的情况,尤其是中国国际角色转换的影响。如何将全球化的有效推进与民族主义的合理伸张结合起来,这并不轻而易举。比如,在中国向世界供给治理方案的过程中,如何正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与全球化之下的资本主义,如何理解“中国方案”的中国性与世界性,这都涉及如何在全球融合背景下合理定位民族主义的边界与内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处于进行中,远没有到完成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更不可能以本位方式去“裁剪”世界,民族主义作为集体记忆、尊严和认同,符合“必要性、功能性与根植性”的需求,但是,民族主义的合理实现更为关键。

## 一、现代国家建设中民族主义的“催化”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民族主义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它是以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何种形式加以表现。伴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民族主义并不是被弱化了,相反,民族主义获得了内源动力,并参与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笔者认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民族主义的角色-功能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即通过国家建构的形式,参与现代化建设。当然,在9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力量的兴起,特别是网络技术的产生,社会层面自主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出现,但是,这一时期,国家建构民族主义的力量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对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融入全球化的发展趋向,国家通过有机纳入民族主义的构成要素,释放建设能力和发展活力,并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效果,在国际范围内为中国的利益实现确立了较为有利的国内基础。因此,探究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角色-功能构成,并解析其形成原因,对于理解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即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还比较多地继承了革命、建设时期的民族主义范式,对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关系的理解还比较少,普遍沿用世界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以及民族自主理论等去分析和建构民族主义角色-功能。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区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

首先,在国内层面,民族主义表现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问题。其实,早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比较明确地阐述了国内民族关系的处理原则,即“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sup>[4](p93)</sup>这一民族关系的处理原则,最终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最高目标,因为通过民族团结,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整合,服务于国家建设。当然,国内民族主义的建构方式,意在形成普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范式,尽可能消除两种民族主义倾向,即“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一方面,国内民族主义的建构来源于革命战争年代民族联合、民族合作、民族融合的历史资源支持;另一方面,它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建设有效实现的重要保障。这在不少学者的论述中都得到了显著的体现。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国内民族主义的国家建构方式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演变为日益成熟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它保证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汉族占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整合,确立集体记忆、尊严和认同。无论是在革命、建设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对于国家发展来说,这都是重要的力量来源。

其次,在国际层面,民族主义延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分析框架,基于阶级二分的方法,将民族主义区分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民族主义。当然,这一民族主义建构范式需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构成批判的对象,与之相对,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取代和超越。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内部存在民族区分,不过,阶级区分要高于民族区分。但是,不可否认,牺牲民族的无差别对待也是难以接受的。比如,有学者就指出,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政治发展绝对不能离开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舞台,为此必须依靠民族力量首先赢得政治独立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只有依靠民族的力量解放全人类(包括各被压迫民族)才能最后实现本阶级的自身解放。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sup>[5]</sup>可以看出,民族本位被有机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之中,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相反,民族主义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阶段性特征,反而显得不可或缺并更为实际。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民族主义在国际层面的建构也不断发生变化。虽然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理论和阶级方法仍然延续,但是,由输出革命到融入世界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重塑民族主义的内涵与边界,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吻合。

在这一背景下,从90年代开始,对于民族主义在国际层面的建构,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比如,它既要延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理论和阶级区分,又要正视融入全球化的现实;既要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同基础,又要回应国际范围内的各种挑战,并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持续推进,这不可避免带来了民族主义建构的系列挑战。

第一,它逐步确立国家利益实现中民族的主体角色-功能,弱化之前世界革命理论和阶级二分方法的理论和实践作用。当然,这并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理论和阶级二分,而是在更为实际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挑战面前,选择更为便宜有利的民族主义建构范式。比如,有学者对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目标设定作出描述,“第一个目标是文化民族的自治和政治独立,即建立自己民族的国家。第二个目标是在已经独立的国家中培养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对外维护和扩大本民族的利益”。<sup>[6]</sup>可以想象,以民族主义的角色-功能,可以确保中国在国际层面国家利益的更好实现,这相比之前的世界理论和阶级二分,既能有机融入世界交往,也能尽量避免冲突,毕竟民族本位的国家利益实现方式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构性。

第二,它在确立民族主体角色-功能的过程中,持有较为温和的理论倾向,但是,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向传统、向“王霸”的回归。特别是延续下来的世界革命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被有机融入民族主体角色-功能分析之中,这强化了国际范围内中国民族主义的主体本位和对抗情绪。比如,萧功秦在90年

代就指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两方面的问题,即“原有平均主义和阶级斗争不再具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感召力与整合作用;具有反对传统的主流文化性质的爱国主义由于缺乏‘国性’那种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显然缺乏足够的民族凝聚力”,因此,“在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政治中心,面临着如何避免意识形态资源因缺乏必要的补充而‘空洞化’和贫乏化的困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新的权威合法性资源,以实现转型中的社会人心的凝聚与整合,是当今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sup>[7]</sup>这一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中民族本位的建构方式,非常容易导向对传统的回归。事实也正是如此,萧功秦得出结论,“在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与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功能已经淡出以后,民族主义作为国家与社会共同体凝聚力的功能意义也自然会突显出来”,这时,“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形态即儒学,将会成为国家凝聚力的新资源”。<sup>[8]</sup>当然,对于传统的回归,或者将其作为民族本位建设的合法性资源,不同学者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奇怪的是,这种差异和分歧最终都指向了中国传统这一替代性方案。比如,汪晖认为,“在寻求整合民族的文化价值时,也不应仅仅从本民族的利益和资源出发,而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追求一种合理性”。<sup>[9]</sup>盛洪则指出,“民族主义可以救中国,却不能救世界。如果不能救世界,也就不能最终救中国”。因此,“民族主义文化虽然会在天下主义文化面前取得胜利,但它最终会导致人类的灭亡。能够使人避免这一灾难的只能是天下主义文化”。<sup>[10]</sup>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主义的国家建构中,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组成要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这一构成要素并不因为融入全球化的实践而被抛弃,相反,它只是更多地让位于现实问题的迫切性。二是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民族本位的同构性与世界交往和合作经常处于变动的冲突之中,它在现代化建设这一现实任务面前,经常需要对民族本位,特别是民族本位之后的世界理论和阶级二分作出约束,如此才能保证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并且,抛开民族本位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也是缺乏基础和竞争力的,它不得不依赖于这一重要的集体认同。正因为如此,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的后半段,虽然民族主义在社会层面出现了一定的对抗情绪,但是,国家在建构民族主义认同的过程中,有意地约束了这一倾向,并尽可能避免民族主义发展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障碍因素,甚至将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转换为新一轮的分化和对抗阶段。“如果一定要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来界定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话,那么,我们实行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而不可能是以往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或民族扩张主义。”<sup>[11](p348)]</sup>总体而言,这一阶段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角色-功能,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比较好的“催化”作用,既满足了国内的集体认同需要,也应和了国际范围内民族本位的同构性。尤其是比较好地平衡了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解决了融入世界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理论和阶级二分,并在维持二者之间平衡的基础上重新定义民族主义的内涵与边界,比如对传统的引入和纳入民族主义合法性资源构成。

不过,维持这一平衡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笔者认为,在80年代和90年代,之所以能够实现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角色-功能,要归功于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历史资源的合法性继承与发展,特别是在革命和建设阶段积累的民族认同。虽然在改革开放阶段,世界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在处理民族主义建构问题上逐渐让步,但是,不可否认,之前阶段民族整合和民族融合的力量支撑了这一转变,为全新阶段集体记忆、尊严与认同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基础,否则,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角色-功能也无法如此轻易地实现。第二,国家实力的差距与国际竞争格局的强化,这迫使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世界革命理论和阶级二分的让步,并形成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理论范式。在改革开放经过20多年的时间,到2000年为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发展,虽然经历了比较高速的增长,但是,中国与国际主要大国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这迫使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建构不得不回应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微妙平衡。第三,国内民众对于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态度分化。一方面,不少民众持有抵触和戒备心理,另一方面,令人担心的是,面对巨大的国家实力差距,很容易导向“投向西方的怀抱”,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言,无疑是抽去其重要的国内认同基础。面对国际范围内普遍的民族本位这一同构性,它要求国家自上而下地建构民族主义新范式,以寻求现代化的认同基础和力量支撑。第四,技术条件的限制,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在90年代的国内刚刚起步,面对民族主义的现实需求,它只能依赖于传统的国家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加以建构。这一建构方式比较好地回应了民族主义的现实需求。同样,又因为现代化的持续推进,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民族主义的建构方式在21世纪呈现出多样特点,尤其

是社会的崛起和参与,它改变了民族主义建构中国家的单一角色,产生了自下而上的型塑作用。

## 二、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的“逆向”效应

进入21世纪,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开始迅速崛起,并与之前国家自上而下建构的民族主义范式形成互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国家层面的民族话语、确立社会层面的民族认知。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比如,许纪霖曾分析过90年代以来中国“反西方主义”的三波思潮:第一是90年代初提出的种种反西方言论;第二是90年代中段的后殖民主义、制度创新说和文明比较论等;第三是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所引发的反西方主义。<sup>[12](p212)</sup>不可否认,民族主义思潮在社会领域的兴起确实起源于90年代,但是,需要承认的是,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形成影响力却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笔者认为,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自上而下建构的民族主义范式构成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角色—功能的主流,它始终尝试维持融入全球化与确保民族本位这一同构性之间的“艰难”平衡,并在世界革命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上作出了比较大的让步。一方面,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范式需要民族认同作为持续推进现代化的动力支撑,这是面对国际竞争的必要构成;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对超出这一平衡关系的民族主义活动加以约束。这一时期,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化和不断高速增长的经济就是最好的结果。因此,主导90年代的仍然是国家自上而下建构的民族主义范式,尽管社会领域自主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蠢蠢欲动”,试图与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形成互动和合流。

其实,从许纪霖所描述的三波“反西方主义”思潮就可以看出,第一波不仅在社会领域,即使在理论界也未形成影响;第二波在理论界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但是,它严重脱离社会话语,与社会领域的民族主义情绪很难形成互动,至少如后殖民主义、新左派、文明论等来源于西方的辞藻,不是社会大众所能容易接受并转为民族主义认知的;第三波即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才能称之为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只是这本书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舆论还只能作为自主民族主义思潮的萌芽,因为它既缺乏较为完整的理论话语,又缺乏民族主义实践作为呼应。基于此,笔者在分析21世纪社会领域自主的民族主义思潮时,会追溯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萌芽阶段。除此之外,笔者将以王小东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为案例,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领域自主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并形成影响力,实现与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的互动,乃至塑造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话语和社会层面的民族主义认知。王小东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非常具有代表性,之所以可以用于分析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根本原因在于它实现了与社会大众话语的同构,这是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换言之,理论界的民族主义话语与社会领域的大众认知实现了对接,并转换为实际的民族主义行动。

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国内出现了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甚至在当时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和价值认知。其实,早在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就连续三期刊发了有关民族主义的专题论文十多篇,并且,在1996年其又连续三期刊发了民族主义专题论文十来篇。这样高度集中地论述、阐释、研究民族主义,一方面说明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平衡关系经常遭遇挑战;另一方面,说明民间力量开始参与到民族主义的话语构建和观念表达之中,它呼应了社会领域民族主义的兴起。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能够反映社会领域的、自主的民族主义诉求的,要数《中国可以说不》,它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共同组成90年代后半段民族主义的“三部曲”。<sup>①</sup>如果加上《超限战》,<sup>②</sup>则构成了民族主义的“四部曲”,集中表达了这一时期社会领域民族主义的萌发和自主建构。

在《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作者并没有遵循严格的理论逻辑,更多选择民族情绪的表达。虽然在不少批评者看来,这构成了主要的缺陷。不过,笔者认为,作为社会领域自主式民族主义思潮的萌芽和兴起,恰恰因为其不遵循理论逻辑,反而更为符合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并造成普遍的社会认

① 参见: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90年代后半段(1996—1999)民族主义“三部曲”指宋强等著《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李希光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房宁等著《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参见:乔良等著《超限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同。即使如此,这本书的立论和民族情绪渲染还是有一定的逻辑前提的。这就是建立在二分法基础上的“你们”与“我们”的差别、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分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等等。这一理论前提构成这本书得以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支撑,离开二分法基础上的对立,要挑动国人民族主义神经的陈述是很难奏效的。比如,作者在书中对于“对抗”的理解、对于“求同存异”的重新定义,他们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视为一个本质上竞争的、求生存的过程。这会得出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是对于西方国家的竞争,即使存在合作,也是竞争大于合作;二是对西方国家的取代,即用中国的价值资源和方案取代存在着对立的世界秩序,大部分时候其都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其续篇《中国不高兴》一书中,作者在逻辑性上有不少提高,并在内外批判的基础上尝试供给民族主义的全球治理方案。<sup>①</sup>不过,关键在于,二分逻辑得到了坚持和延续,如“英雄国家”“有条件决裂”等。其实,这一逻辑前提在其他几本著作中都有体现,它们几乎一致性地使用这二分与对立的逻辑前提,并将其与民族记忆、尊严和情感联系起来,获得普遍的社会同情。比如,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作者就指出,“美国舆论妖魔化中国的核心原因与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就是美国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倾向和美国必须保持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sup>[13](19)</sup>这里,作者使用了阶级二分的方法。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中,作者使用了新殖民主义以及阶级分析方法。在《超限战》一书中,作者则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即战争不是减少了,而是改变了形式,对立始终存在。

其次,在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潮正式开始了自主式建构。经过90年代的准备和酝酿,特别是90年代后半段理论界与社会领域的互动与对接,这样一套便宜有效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范式开始逐渐形成。社会领域自主式建构民族主义范式,需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前期准备和集体感情。这在9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和社会事件中,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共识的确立。第二,感情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确立。这是21世纪民族主义思潮得以崛起的重要方面,毕竟,停留在民族情绪阶段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很难发展的,更不要说转变为民族集体行动。第三,社会领域自主性民族主义行动,呼应民族主义理论和思潮。90年代虽然也发生了一系列中美争端事件,但是,基于国家自上而下建构的民族主义范式居于主导地位,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及其行动还是比较少的,或者也是处于“平衡”关系之中。但是,从1999年开始以及进入21世纪,社会领域自主性民族主义行动开始增多,呼应自主式建构的民族主义思潮。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社会领域自主式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必然要求与国家建构式民族主义范式产生互动。一方面,国家在处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平衡关系中,离不开国内民族主义认同支持,这要求其不得不回应社会领域自主式民族主义思潮;另一方面,自主建构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行动,在与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范式互动过程中,容易摆脱这一平衡关系,要么在国家层面塑造民族主义话语,要么在社会层面产生民族主义认知,这反过来会削弱国家对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平衡关系的有效把控,进而造成国际层面的冲突、对抗。

以王小东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为代表,它宣告了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开始理论的体系化建设。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中,作者明确提出了民族主义的两个前提假设,“一是生存空间的问题;二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sup>[14]</sup>建立在这两个假设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中国发展的四个挑战,即“(1)生存空间的狭小、自然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恶化。(2)科技的落后。(3)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4)民族精神的矮化、民族凝聚力的丧失”。<sup>[14]</sup>解决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必然要从对立基础上(即少数与多数)去争生存、寻发展,相信“强权即真理”并没有过时。<sup>[14]</sup>并且,在世界体系没有改变现有不自由、不平等的基础上,只能通过前述两个前提来获取自由和平等,而这样一个自由平等包容的世界体系,“只能产生于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西方人的道德和仁慈”。<sup>[15]</sup>当然,对王小东的批评也是非常之多,特别集中于其情绪化和非理性化的缺陷与不足。<sup>②</sup>不过,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其情绪化与非理性化,包括对于

① 参见:宋晓军等著《中国不高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黄军甫著《民族主义内涵嬗变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② 参见:陈大白著《民族主义的中国道路——评王小东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说》,《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任丙强著《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兼评王小东的民族主义观》,载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关系的界定,而是在于:他为中国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提供了简单便宜的理论框架,后续社会领域自主式民族主义建构方式基本沿用了这一逻辑假设。另外,王小东之所以能够将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除了与民族记忆、尊严和认同相关之外,还与当时国际范围内的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争端紧密相关,尤其是这种国际争端逐渐转变为社会领域的民族主义行动。比如,从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到2008年家乐福事件,到2012年反日游行事件,乃至到2016年中国网络空间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等,社会领域的民族主义范式已经实现由理论向行动的转向,并且呼应王小东将民族主义与集体回忆、尊严、认同相关联的做法,因为它在现实中获得了直观的证据。

至此,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领域自主式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开始参与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过程,并充分释放了巨大的社会能量。那么,有哪些因素造成了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自上而下建构民族主义范式,逐步转向社会领域自主式建构民族主义范式,并形成与国家建构的互动,乃至型塑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民族话语与民族认知?笔者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发展,推动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尤其是2010年前后中国超越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社会层面的民族信心不断增强,同时,对于国际层面的不公正、不平等以及霸权,抱有更为激烈的态度。第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加深,特别是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认知的深入。一方面这会吸收其民族主义建构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会对其持有更为客观的看法,它有助于社会层面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第三,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造成社会领域自主互动的持续增多,社会活力和社会自主性不断增强,它既可以回应国家的民族主义建构,也可以将国家的克制与让步以直观的形式展示出来,并持续推进。互联网的发展是社会领域自主式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重要技术条件。第四,集体回忆、尊严与认同构成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感情基础。当这一感情基础与民族理论体系相结合,会进一步完善社会领域自主性民族主义思潮。第五,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冲突与霸权,激化了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感情,它是自主式建构民族主义范式的直接推手,并基于社会自主性,转换为民族主义行动,形成参与国家层面民族主义范式建构的巨大动能。

当然,社会领域自主式建构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对于国家民族主义建构而言,其在很多时候是必要的,但它区别于前一阶段的关键之处在于:容易忽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平衡关系。这隐藏着社会对于国家的“逆向”效应,尤其是面对持续推进现代化和不断融入世界的趋向性,它要求国家与社会在民族主义建构过程中达成必要的共识。

### 三、民族主义如何达至未来的良性上下互动?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面对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参与国家层面民族主义范式的建构,甚至在很多时候打破国家建构民族主义尝试维持的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平衡关系,这引发了民族主义在中国新一轮的发展变迁需求。究其原因,根本在于社会领域自主式建构的民族主义范式,其在逻辑前提上并没有处理好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甚或说,它根本不屑于处理这一难题。与之相反,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正是通过打破这一平衡关系,才能获得社会成员普遍的民族情感和价值认知,由此而可能引发的冲突和矛盾,反而成为进一步证实自主式民族主义范式的重要依据。特别是,社会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完成对二分法基础上“西方”“资产阶级”“他们”“施害者”等的批判之后,不断尝试寻求一种替代性方案,而这一方案的理论资源又经常性地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这一替代性方案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遥相呼应,掺杂着潜在的“霸权更迭”趋向。

到目前为止,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供给世界的替代性方案还处于比较模糊的阶段,但是,在理论界,有关方案的争论则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90年代。这一有关世界秩序的替代性方案的争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的认知判断,很多时候,它并没有回应各个学者提出的治理方法,相反,却回应了打破平衡关系之后的“霸权更迭”趋向。现下,通过与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的有机互动,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比如,赵汀阳比较早地提出的“新天下”概念,它“是一个谋求人类普遍安全以及共享利益的制度”,其“决不是统治世界的一种新体系,而是世界的‘无外’(inclusive)监护体系,它试图监护世界以共在方式作为存在方式,放弃自现代以来的排他(exclusive)存在方式,从而避免人类命运的彻底失败”。<sup>[16]</sup>直白一点,他是批评西方近代以来确立的世界体系建立在



霸权和排他性基础之上,试图通过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来取消任何意义上的霸权,并实现共治共享的世界秩序。另外,如许纪霖提出的“新天下主义”或“天下主义的2.0版”,是通过否定西方的特殊主义倾向,将世界建立在中国传统的普遍主义基础上;<sup>[17]</sup>刘擎提出的“新世界主义”,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天下资源;<sup>[18]</sup>盛洪提出的儒家“天下文明”,则用于解决国际范围内国家、民族和宗教冲突;<sup>[19]</sup>等等。

这一系列的替代性方案不胜枚举,不少学者围绕着这一问题都进行过相关阐述,比如潘维、汪晖、甘阳、张颐武、康晓光、王小东等。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从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中挖掘可以利用的民族主义范式,并在否定西方范式的基础上,扩展其内涵与边界,试图解决西方文明不能解决的世界秩序难题或者说“固有性缺陷”。但是,这是否可能实现?有学者从“天下主义”的内涵变迁指出,“‘天下’并非完全是一种去‘异端’、去‘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模式”,秦一统后的“天下”构成权力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撑,这会演变为民族主义的有利工具(尽管“将它与‘天下’放在一起讨论本身就缺乏科学性”),并导向文化自负或文化保守主义。<sup>[20]</sup>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在国际层面,西方所开创的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问题,甚至是根本性障碍。但是,在其他国家提出替代性方案之前,西方的世界理论构成了主动或被动接受的“唯一方案”。这意味着既有的世界体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的深深烙印。在否定西方的过程中,会引出两个疑问:其一,是否任何国家都有权利提出相应的替代性方案;其二,西方国家是否还有权利参与未来世界治理方案的协商共治。这两个疑问会给中国民族主义的世界治理替代性方案带来挑战,即中国的民族主义方案是否会导致民族中心主义立场,是否会产生“新的独占性民族理论”。<sup>[21]</sup>第二,在国内层面,因为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建立在二分法基础之上,它忽略乃至否定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平衡关系,以获取民族情感与民族认同。这经常性导致各类学者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在社会领域被转化为相应的“霸权更迭”取向,即在否定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基础上,确立中华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无疑,这一破坏平衡关系的民族主义范式,只能造成国际范围内对中国的警惕与担忧,反而与不断推进现代化与融入世界的初衷产生矛盾。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在全球治理方案问题上,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与理论界出现了隔阂。换言之,社会领域自主式建构的民族主义范式,在脱离了80年和90年代国家主导下的民族主义建构之后,充分释放自身的民族情绪与民族能量,不断强化二分逻辑,它并不追求世界秩序的重塑,或者说,它只信任民族本位的利益实现。当它参与到国家层面民族主义建构之中,必然会造成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关系的失衡。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建立在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之上的理论延续——替代性全球治理方案,也显得软弱而无力。

如何避免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对于国家建构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平衡关系的冲击,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其实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应。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sup>[22](p272)</sup>“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边界和方向。首先,它承认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平衡关系的重要性。毕竟,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同构性仍然存在,“你”“我”一般意义上都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但是,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交往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又是不争的事实和发展趋向,这要求不断处理好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其次,对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建构来说,它开始重新介入国内民族主义的建构,不再无视社会领域自主式的民族主义思潮,并且对其破坏平衡关系的民族主义取向作出约束。最后,对于社会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潮,它比较多地停留在民族情感和民族情绪层面,既容易导向对平衡关系的破坏,又无法与理论上的全球治理替代性方案实现融合。不过,保留社会领域民族主义的认同和支持又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中国民族主义参与世界治理的重要力量支撑,但需要纳入一定的民族主义规范之内,而不是任由其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没有沿用“新天下主义”“新世界主义”“天下文明”等概念,这说明其尽可能避免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的“霸权更迭”趋向,也回避了其理论形态上的“民族中心主义”可能,它尝试确证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持续融入世界的基本态度。只要全球化仍然构成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那么,融入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消除融入的可能障碍乃至破坏性因素就是较为理智的选择。毕竟,从长远来看,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民族主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表现形态,它的最终目标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融合。而从近期来看,全球化“至少会有利于某种社会平等,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有利于建立一种标准的、共同的沟通媒介”,<sup>[23](p149)</sup>这正是民族主义所加以诉求的,或者



说,民族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效地保证了国内民族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避免其可能的“阴暗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没有否认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的动力来源和必要支持,更是间接承认了其理论形态上替代性方案的中国要素。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肯定民族基础之上的民族融合与国际合作,民族国家单位仍然是国际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更不用说民族主义在今天的国际秩序中仍然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面对国际范围内普遍的民族主义同构性,放弃民族主义基础支撑无疑是脱离实际的。这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案供给肯定具有深深的中国烙印,但是这并不排斥其他民族国家的参与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达成共治性治理安排,包括西方国家的参与,而不是简单的排斥西方、否定西方乃至对西方的“霸权更迭”。民族主义提供了现时条件下“集体信念、尊严和希望”的可能性,虽然它不一定是唯一的,但肯定是要素之一。<sup>①</sup>对这一点的肯定,其实就是承认社会领域自主式民族主义建构的合理性。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民族主义对于世界治理方案的供给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和传统文化的表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民族主义发展变迁上的表现形态,弥合了国家自上而下民族主义建构与社会自下而上自主式民族主义建构之间的潜在矛盾。一方面,它承认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构成国家建构民族主义的重要支撑,并且这符合现阶段国际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同构性;另一方面,它并不承认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对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平衡关系的否定,并对这种逻辑前提上的理论和行动加以约束,使其符合中国不断现代化和持续融入世界的现实需求。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与互动,构成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变迁的新形态,它也必将更好地支撑中国参与全球秩序的塑造。

## 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角色-功能贯穿现代化建设与融入世界的全过程。一方面,它继承了革命、建设年代的民族主义资源,这使得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建构显得便宜有力,实现了整个国家建设方针的迅速调整。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国家建构民族主义的“式微”以及社会自主性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面临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社会领域自主式民族主义范式表现出对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平衡关系的忽视,从二元对立的逻辑出发,获取民族感情与价值认同,这在参与国家民族主义建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平衡关系的破坏。甚至最后,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与其理论上的替代性方案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节”。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要求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进入全新阶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它实质上完成了国家建构民族主义与社会自主式建构民族主义的有机互动和融合,这必然会推动中国更为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更好地实现中国利益与国际利益。

未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变迁,从理论角度而言,它关键在于有效处理好中国融入世界与保有民族主义基础支撑之间的关系,即普遍存在的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平衡关系。这一关系的处理,既需要国家的有效“调控”,又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从而达成有机的上下互动。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乃至整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更迭,都是处于现代主义的框架之中,它主要涉及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转型问题。在这几个领域,都有相应的民族主义表征。因此,现代主义框架下的民族主义思潮,不可避免地会立足于这样的前提之上,“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对于现代世界而言,它们是社会存在意义上的必要组成,并且,在前现代,不存在民族与民族主义”。<sup>[24](p72)</sup>但是,这样的民族主义建构逻辑是否不存在任何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比如:在经济民族主义领域,“经济转型理论与事实并不相符”、“经济转型理论是一种化约论”等;在政治民族主义领域,“政治转型理论对于国家的产生是一种误导”、“政治转型理论无法解释对于前现代伦理纽带的坚持”、“政治转型理论同样也是一种化约论”等;在文化民族主义领域,“文化转型理论并不能解释民族主义所产生的热情”、“盖尔纳的理论是一种实用主义,他是从民族主义的结果来说明其角色-功能”等。<sup>[24](p120-137)</sup>这一系列的批评,无疑会让人们

<sup>①</sup> 参见:安东尼·D.史密斯著《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厄内斯特·盖尔纳著《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181页。这里,史密斯和盖尔纳对于民族主义作为集体要素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二者均认同民族主义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怀疑现代主义视角下的民族主义建构是否正确、是否有意义。毕竟,国内有关民族主义的系列讨论、研究和行动都是立足于现代主义基础之上。即使有其他路径的民族主义研究,也同样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如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等。

其实,民族与民族主义从其产生开始,并没有被强制赋予特定的内涵、规定具体的边界,它总是与特定的问题相关联。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主义发展而言,它延续了自近代以来独立与富强的目标诉求,那么,民族主义不失为一种承载集体记忆、尊严和认同的重要载体。或者,如史密斯所理解的,民族主义的“必要性、功能性与根植性”,使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没有其他“文化框架”可以扮演比其更好的角色-功能,至少在全球性的“集体信念、尊严与希望”产生以前,都是如此。因此,我国民族主义的发展需要在现代化建设与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往前推进。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黄军甫.民族主义内涵嬗变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J].社会科学,2018,(4).
- [3](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龚维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5]李景荫.试论无产阶级民族主义[J].国际政治研究,1989,(4).
- [6]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J].欧洲,1993,(5).
- [7]萧功秦.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J].战略与管理,1994,(4).
- [8]萧功秦.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J].战略与管理,1996,(2).
- [9]汪晖.文化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J].战略与管理,1994,(4).
- [10]盛洪.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6,(1).
- [11]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12]许纪霖.另一种启蒙[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 [13]李希光,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14]王小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J].战略与管理,2000,(5).
- [15]王小东.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9,(3).
- [16]赵汀阳.天下秩序的未来性[J].探索与争鸣,2015,(11).
- [17]许纪霖.新天下主义:对民族主义与传统天下主义的双重超越[J].探索与争鸣,2016,(5).
- [18]刘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J].学术月刊,2015,(8).
- [19]盛洪.天下文明——论儒家的国际政治原则[J].文史哲,2013,(5).
- [20]胡键.“天下”秩序:一种文化意象[J].学海,2017,(4).
- [21]天下体系与未来世界秩序(第三单元·自由讨论)[J].探索与争鸣,2016,(5).
-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23](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 [24]Umut Özkirimli. *Theories of Nation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责任编辑:郭荣华)